

葛兆光 徐文堪
汪荣祖 姚大力 等著

《东方早报·上海书评》编辑部编

殊方未远

古代中国的疆域、民族与认同



中华书局

殊方未远

古代中国的疆域、民族与认同

葛兆光 徐文堪
汪荣祖 姚大力 等著

《东方早报·上海书评》编辑部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殊方未远:古代中国的疆域、民族与认同/葛兆光等著;《东方
早报·上海书评》编辑部编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6.8
ISBN 978-7-101-12000-4

I. 殊… II. ①葛…②东… III. ①疆域-研究-中国-古代②
民族历史-研究-中国-古代 IV. ①K928.1②K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69353 号

书 名 殊方未远:古代中国的疆域、民族与认同

著 者 葛兆光 徐文堪 汪荣祖 姚大力 等

编 者 《东方早报·上海书评》编辑部

责任编辑 李世文 徐麟翔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920×1250 毫米 1/32
印张 13 $\frac{5}{8}$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

印 数 1-8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2000-4

定 价 65.00 元

前 言

古人惯以“殊方”称呼边远偏僻之地，如白居易有诗云“殊方我漂泊”，且常与“异类”并举，所反映的深层心理不难理解：地域既已不同，自然非我族类。杜甫诗云“殊方日落玄猿哭”，意象即极为凄厉，从中可以见出古人心态。然而，倘若我们不再像古人那般，以“中心”自居，视八方四面为蛮夷，而是积极地转换视角，深入、多面地了解周边地区、民族的语言、风俗与文化，或许会发现：他们对我们来说，并不那么陌生而难以理解。这也就是书名“殊方未远”的意义所在。

全书大致分为七个部分。第一部分侧重于理论。葛兆光、许纪霖、吴冠军等学者，分别将视野投向“什么是‘中国’”这个核心的问题。为了讨论清楚这一看似简单、实难回答的问题，则必须借助“周边”的视角。这就牵扯出了中国与亚洲的关系这一问题，进而将讨论延伸至疆域、民族等领域。诚如葛兆光先生所言，当我们把中国尤其是“近世中国”放在“周边”的背景中观察时，才能真正看清“什么是‘中国’”；中国不仅仅是“中国语境中的中国”，也是“全

球背景与亚洲视野中的中国”。

第二部分是徐文堪先生的一个小专号。徐先生长期从事古代中亚和内亚文明（尤重吐火罗学研究）、古代中外关系、欧亚大陆史前史、语言学、辞书学、人类学和域外东方学史等方面的研究，在《上海书评》发表了大量嘉惠学林、裨益读者的文章。我们从中选取访谈、杂记与悼文各一篇，都涉及徐先生长期关注的丝绸之路与吐火罗学研究。

第三部分是辽史专题。我们曾沉痛地以纪念专号送别未尽其才就因病去世的刘浦江教授，这里收录了他与学生合撰的关于《辽史》点校工作的遗作；我们也欣喜地迎来了后起之秀钟焱先生，他的访谈对当下正走红的内亚史研究做了扎实的梳理。其余两文，一从契丹文、一从壁画切入辽史研究，均令人耳目为之一新。

第四部分则着重关注蒙元史。无论是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教授还是中国学者张帆、罗新两位教授，都贡献了极为精彩的论述。陈毓贤女士则生动勾勒出了天才蒙古学家柯立夫少为人知的一面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罗新教授《我们不是“黄种人”》（本书题为《世上本无“黄种人”》）一文发表之后，曾经引起网络舆论轰动，也惹来诸多非议。或许，这恰恰坐实了他在文中所说，关于种族问题的许多理论成果“在中国社会还远远不是常识”。此外，作为极少数能够综合使用考古学、人类学、民族学（Ethnology）、语文学（Philology）和历史学方法与资料的内亚史学者，狄宇宙先生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与创新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第五部分既是藏学专号，也是沈卫荣教授专号。作为在西方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语文学家，沈先生并不汲汲于锱铢晦涩的考辨，而是以通俗流畅的方式为我们深入介绍了国内外藏学的发展情况，

谈“腐败”与“改革”一文，更是借助叙事学理论进行藏学研究的力作。

第六部分涉及一段学术公案。近年来，“新清史”研究渐成国内外学术热点，赞许者有之，批评者亦有之。姚大力教授属于前一“阵营”，汪荣祖教授则加入了后一“战队”。这里收录的是汪、姚两位你来我往的论战文章。在这一过程中，火药味虽不免渐趋浓烈，精彩程度却并不因而减损。这一论战，将“新清史”在国内受到的关注推向新高，并使之从学院深处走向公共舆论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因为所处学术语境不同，两位教授在一些人名、书名的译法上各有所取，出于尊重作者的考虑，我们一仍其旧，未作更动。

第七部分放在最后，但绝非不重要，“新清史”领军人物欧立德教授结合满文谈满族认同，乌云毕力格教授从文献史料角度谈满文，朱玉麒教授从边塞纪功碑谈国家认同，咎涛先生从奥斯曼帝国看中国的国家认同。角度虽有不同，关怀却多有相通之处。

《上海书评》创刊八年来，曾推出过多种文章结集，但出版这样一本集中讨论疆域、民族与认同问题的集子，尚属首次。在此，感谢各位作者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与厚爱，也请广大读者不吝批评、指正。

《东方早报·上海书评》编辑部

目 录

前言.....	1
---------	---

从历史看中国、亚洲、认同以及疆域

——关于《宅兹中国》的一次谈话

..... 葛兆光/口述 盛 韵/整理	1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葛兆光再谈“从周边看中国”	张明扬 丁雄飞/采写 13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

多元脉络中的“中国”	许纪霖 30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许倬云新著《华夏论述》解说.....	葛兆光 49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如何拯救历史?	吴冠军 68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徐文堪谈西域研究.....	钱冠宇/采写 77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维也纳归来谈吐火罗学.....	徐文堪 93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悼印度杰出学者纳拉扬教授.....	徐文堪 107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钟焯谈辽史与内亚史研究·····	郑诗亮 / 采写	113
《辽史》的纂修与整理·····	刘浦江 / 撰 邱靖嘉 / 整理	136
寻找契丹后裔·····	刘凤翥	146
墓室壁画中的辽人·····	李清泉	154
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?·····	罗 新	165
杉山正明谈蒙元帝国·····	黄晓峰 / 采写	175
张帆谈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·····	黄晓峰 钱冠宇 / 采写	185
狄宇宙谈内亚史研究·····	罗 新 郑诗亮 / 采写	200
世上本无“黄种人”·····	罗 新	213
蒙古学家柯立夫其人其事·····	陈毓贤	222
沈卫荣谈西藏与藏学热·····	张明扬 / 采写	230
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形式的“腐败”与“改革”·····	沈卫荣	246
美国藏学主流的学术传承和学术批评·····	沈卫荣	254
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·····	汪荣祖	270
不再说“汉化”的旧故事·····	姚大力	287
“新清史”之争背后的民族主义		
——可以从“新清史”学习什么·····	姚大力	300
为“新清史”辩护须先懂得“新清史”		
——敬答姚大力先生·····	汪荣祖	324

略芜取精，可为我用

——兼答汪荣祖 姚大力 340

学术批评可以等同于“打棒子”吗？ 汪荣祖 363

欧立德谈满文与满族认同 盛 韵 / 采写 376

清史研究岂能无视满文文献 乌云毕力格 385

朱玉麒谈清代边塞纪功碑与国家认同 黄晓峰 钱冠宇 / 采写 393

奥斯曼帝国崩溃了，中国却没有 咎 涛 414

从历史看中国、亚洲、认同以及疆域

——关于《宅兹中国》的一次谈话

葛兆光/口述 盛 韵/整理

最近，我会在北京的中华书局和台北的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一本新书。这本书用了西周青铜器“何尊”铭文中的一句话“宅兹中国”当书名，主要是想讨论“亚洲”或“东亚”、“中国”以及“民族国家”、“认同”、“疆域”这样一些问题，大部分章节都是由这八九年来发表的论文构成的。也许，这就是我最近这些年所思所想所做的一些事情，因为其中的问题、思路和旨趣有一定的连贯性，所以，我把它编成了一本完整的书。

你也知道，关于“认同”、“国家”、“民族”、“疆域”以及“亚洲”或“东亚”，在现在中国学界已经有很多讨论，一些新理论、新概念和新话题很吸引人。不过你也可以发现，有些议论，你说不清它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，但会占据很大的言论空间，有很大的影响。有一些人挪用来自西方学院的一些时髦词儿，又填上一些似乎有关中国的空洞话题，所以，读者会认为他们既能够跟国际接轨，又能够

谈中国问题，而且他们在政治和思想的论题里，能够提供来自最“前沿”的学术性资源，有人觉得这样才既有“思想”也有“学术”。还有一些人常常对中国的政治、社会和文化发表高屋建瓴的意见，好像在谈历史，其实，这些人未必真的能够深入中国，又未必真的拥有历史知识，却形成一定的气候，这也是与似乎有着学理资源的提供和历史论述的提供有关的。所以，如果你与他们一样讨论这些问题，如果没有相当的学理支持和历史论述，很难正本清源，说服读者。王元化先生曾经说，应该是“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”，这话很对，我也觉得思想和学术应该有互相支援的关系。

不过，我写这本书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下思想论争所刺激的结果，但主要还是出于学术上的考虑，包括资料、角度和视野的考虑。我和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一样，对于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，所以，基本上还是讨论历史，希望从历史，也就是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来讨论这些问题。

二

《宅兹中国》有一个副标题，叫“重建有关‘中国’的历史论述”。虽然我这本书里也涉及亚洲、东亚、东海等等，但大体上我聚焦的是“中国”，就算是讨论日本关于神道教的争论、日本关于满蒙回藏鲜的学术史，讨论朝鲜的史料中的一些问题，其实也还是聚焦在“中国”的。不过，什么是“中国”？这是一个看上去普通，却很难说清楚的问题。为了讨论什么是“中国”，不得不涉及“周边”，通过“周边”——现在时髦一些叫“他者”——的眼睛、资料、视角来看中国。比如说，17世纪以后，东亚诸国的彼此认同和互相排

斥，就涉及民族、国家和历史；而民族、国家和历史的自我认识与他者认识，又会涉及一国和周边诸国的关系；而周边的话题，又牵出来如何理解中国和亚洲的关系；既然讨论中国和亚洲，又会讨论到疆域、族群和历史等问题。

你也许会说，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些问题吗？你看，有人讨论“天下”，有人讨论“帝国”，有人讨论“多民族国家”，有人讨论“知识共同体”。是的，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多少有些担心我的论述方式会被误解的缘故。现在的一些讨论，其实，常常是先引入西方的一些概念工具，用这些概念工具去重组中国历史、文献和资料，把这些“抽取”过的材料推导出一些宏大的结论。你知道，现在讨论“想象的共同体”、讨论“帝国”、讨论“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研究”、“认同的政治”，都是很时尚的，看上去他也是在讨论中国问题，实际上，这些论述多来自西方，而有时候讨论者的眼睛也瞟着西方，看看人家的反应。坦率地说，有的人不太有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基础。用我们过去的说法，这叫“以论带史”，一方面会给国人以误导，觉得这是在讨论历史，另一方面它会把中国历史整编到西方的一些时尚大论述中去，让洋人觉得这就是中国。

我很担心。

三

你问我，我的论述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却又必须回答。

我自己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，主要是通过两个历史的角度去讨论，一个是文献资料中所见的思想史，一个是关于这个问题本身的

学术史，而且也许还会针对这些话题，逆着这些风气，重新进行论述。比如，这本集子里最早的一篇写“亚洲”的文章，就是有很强的论辩性的。因为当时我觉得，有的中国学者急匆匆地跟着日本、韩国学者，去讨论所谓“亚洲文化共同体”，或者“亚洲知识共同体”，也许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。我记得那一年，在台湾大学开会的时候，就争论得挺激烈。我总觉得，如果我们对日本人从明治以来常常使用的“亚洲”一词不加检讨，对日本学界使用“亚洲”作为空间单位来写历史的学术传统不加了解，就会被一种“抽取出来的概念”误导。所以，这里首先需要的就是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学术史的清理，什么是“亚洲”？为什么会“从亚洲出发思考”？为什么“亚洲”可以成为一个历史空间？中国为什么不太有“亚洲”的连带感而日本却有？如果仔细梳理日本习惯使用的“亚洲”这个历史概念，你可以看出，一方面日本从明治时起，关于“亚洲”研究或者“东洋”研究就伴随着现代性的知识背景，另一方面使用“亚洲”作为历史单位，也有日本的国家主义、扩张主义的政治意图。我当时的疑问就是，你怎么能把这些背景都剔除了去谈“亚洲”呢？这些问题都必须从学术史出发去清理，才能讲得清楚。

我相信，最近这些年中国最重要的问题，将是一个越来越引人瞩目的中国与周边在文化、政治和经济上如何相处的问题。我们已经遇到很多麻烦，政治上的麻烦，当然应当由政治家根据国际法去处理，可是你也可以看到，有人相当轻蔑历史知识却动辄讲“历史”，在这些问题上，既不会把历史疆域与现实领土问题分开，也无法讲让周边都接受的道理。可是，还有些学者虽然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意义，也特别想介入这些领域，但是，他们要么一下子就落入带有政治意识形态性的论述，不是学术立场的讨论，要么一下子就投

人时髦理论的窠臼，拿了大理论大概念说一些空话。

四

再说一遍，我讨论的是学术意义上的历史，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现实，所以我想强调：第一，这些问题的讨论，应当是从有关“中国”、“亚洲”或者“世界”的认识的历史资料，包括中国和朝鲜、日本的历史资料中出发，把问题放在思想史脉络或学术史语境中去讨论，而不应当是从来自西方的“理论预设”下去倒着看历史，或者从现实利害的角度做“提供证据”似的历史论证。第二，我也不想从“政治”和“策略”，而是从“历史”和“文化”，也就是说，从中国的文化认同和历史渊源去追溯“中国”，所以我才会再三强调，在所谓“认同”的问题上，“历史”、“政治”和“文化”应该有适当的差异；同时，你也必须认清“国家”（祖国）、“政党”（执政者）和“政府”（王朝）的不同，而不是把“认同”和“国家”一锅烩在一起，让所有人都必须在这个问题上，一二一齐步走。第三，由于东亚尤其是中国的“皇权”，如同史华兹和林毓生说的是“普遍皇权”（Universal Kingship），不仅朕即国家，而且朕即信仰、朕即真理，所以，我强调“国别史”的意味，也强调历史研究常常很难摆脱民族与国家的立场，就像我这本书里提到的日本学者关于神道教、中国道教以及天皇制度之间关系的研究，就是一个例子。但是，这并不是给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，而是提醒历史研究者要小心翼翼地警惕这种不自觉的立场影响。所以，咱们一方面得承认，历史上的国家常常是流动的，仿佛罗布泊一样，空间有时大有时小，民族有时合有时分，历史有时整编在一起，有时又

分开各成一系；但另一方面又得强调，在书写历史上，有民族、领土、认同的国家是要承认的，特别是在东亚，这个“国家”（其实国家往往只是政府）自古以来，是相当强有力地控制和形塑政治、历史和文化的。东亚国家跟欧洲国家很不同，文化控制和历史建构的能力非常强，所以，如果你简单地谈“超越民族国家”，恰恰会忽略对“民族国家”（尤其是专制皇权）的批判。所以，你要把“政治中国”和“文化中国”分清楚，你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论述，是理论的后设叙述，还是来自资料的历史论述；你的历史论述，是在批判这种高度的政治权力和集权的国家控制，还是论证政治一统和国家控制的历史合理性。

我觉得，目前有一些讨论，基本上不是“在中国语境中讨论中国问题”，如果真要“在中国语境中讨论中国问题”，那么，就要问：你是要从中国历史资料中展示出来的中国国家形成、民族认同、疆域变化讨论问题呢，还是通过一套舶来理论来讨论问题？你是基于当下的某种政治意图来讨论问题呢，还是没有预设地去讨论历史？如果要避免一种民族主义的论述，必须要考虑你的出发点，究竟是政治还是文化。

五

这本书，可能呈现的是我这十年来的一些想法。自从2000年写完《中国思想史》以后，我就开始想这些问题，我在序言里面说，这本书里的好些想法，是从《中国思想史》最后一节“1895年的中国”引发出来的，真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1895年以后，中国被整编进世界、亚洲或者东亚的历史里面，你就不得不思考这些认同、

疆域、族群等等问题；因为这些问题，原本好像并没有“显题化”，可是在1895年以后，这些问题都出来了，到了2000年以后，随着中国政治、文化和经济在国际环境中的变化，它就越来越不可回避了。

很长时间以来我就有个想法，这跟梁启超的说法有关。梁启超说，中国历史有三个阶段：中国之中国，亚洲之中国，世界之中国。我觉得，这个说法可以稍稍变通一下。的确，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“以自我为中心想象天下”的国家，所以有天朝观念，也有朝贡制度，这就是“中国之中国”；明代中叶以后，西学东渐，特别是晚清以来，便进入第二个阶段，逐渐变成时时事事以“西方”为尺度来打量中国，中国的好坏美丑都是在西方背景下讨论的，便成了“世界之中国”。这个阶段认识中国的尺度或镜子都来自西方，非苏俄即欧美，从晚清起，不是中体西用，就是西体中用，从“五四”以来，又讨论你是热的我是冷的，你是动的我是静的，你是唯物的我是唯心的，你是特殊的我就是普遍的，你是普遍的我就是特殊的；可是，现在是否应该增加一些观察的角度和尺度？可以从“周边”的资料、立场和眼光重新打量中国，我们能看到中国跟周边其实也有很多细微差异，也可以互相观看，这样，就成了“世界、亚洲之中国”。我一直很强调，千万不要以为所谓“汉字文化圈”、“儒家文化圈”就具有同一性，这其中是有差异的。有一次我在日本的飞机上看到《读卖新闻》编辑委员藤野彰写的评论，那时他刚刚从中国回去，就写了一篇社评叫作《相互理解从对差异的承认开始》，这话很对。我强调东亚诸国之间的差异，就是因为这能够帮助我们反过来清醒地认识中国。

所以，我一直建议推动“从周边看中国”，因为这实际上既包含了“中国观”即中国自我认识的改变，也涉及文化交流史研究方法

的改变。我一直用一个比喻，说过去的文化交流史（常常也可以称为中外交通史）注重的是中外交通，而我们更注重文化互相观看和交流后的结果，就是过去讨论的是结婚，现在讨论的是生孩子。中国文化其实很杂，这是文化杂交的结果，我们不能老是觉得我们还在汉唐时代，只有文化输出，没有文化输入，也只有华夏文化，而没有蛮夷之风。所以我说，17世纪以后，其实朝鲜和日本，跟我们已经“渐行渐远”了。我特别反感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单一不变的汉族及儒家文化，把孔子以来的思想看成至高无上的传统。其实，我们的传统跟我们的人种一样，早已混杂不清了。现在的人对汉、唐无限自豪，可汉、唐恰恰是种族混融的时代。“三十六国九十九姓”成了“河南之民”，渐渐又到关中成了“京兆人”，唐代首都长安好多人就是“胡种”。老祖宗们原本觉得，中国和“夷、蛮、戎、狄”，最好井水不犯河水，所以有《徙戎论》。可事实上“中国”仍是种族交错的天下，不要说李白“生于西域，不生于中国”，刘禹锡是匈奴裔，元稹也是鲜卑后裔，更不要说李渊、李世民了。经过通婚，好多人血缘已经杂糅胡汉，所以陈寅恪说他们因为胡汉杂糅，才创造了唐代的“空前之世局”。

所以，我觉得也应当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。虽然我在书里面强调，应当在历史中研究“民族国家”，而不是把历史从“民族国家”中拯救出来，要注意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分歧由来已久，不可以简单地说有一个同一性“东亚”，但是，我绝不是说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。我只是希望，当你注意到亚洲诸国特别的形成史，亚洲诸国形塑文化和政治的强烈的国家意识，当下亚洲诸国之间由于文化认同崩溃而彼此警惕和戒备的时候，要注意到在历史叙述中“国家”的存在。所以，我也支持在学术研究中，不要只看到“国家”，